

戰時中國文學的雙十節書寫： 國族身份表達與政治話語交鋒*

高 強

[提 要] 雙十節是戰時中國內部文學極富意味的存在。“九一八”事變後，雙十節蘊含的民族革命精神意涵一再被作家們提取並張揚開去，以之為抗戰進程“鼓與呼”。以民族革命精神洗掉國恥的戰時中國文學雙十節書寫，被賦予了“創造新雙十節”即“重造民國”的深意。國慶紀念的有無及冷熱情況，國慶日場景的正面與否與國族身份認同關係密切，因此戰時中國文學還通過諸多國慶冷落場景和被扭曲的“奴才式雙十節”書寫，表達對國族身份立場的堅定維護。當種種不民主、反自由的負面現象大量湧現後，作家的雙十節書寫日漸被不滿、哀怨和失望情緒籠罩，此類雙十節書寫成為呼求自由民主、進行社會批判的絕佳場合。解放戰爭時期，左翼文人的雙十節書寫進一步採取斬釘截鐵的強硬語氣，手持“人民”的利器發出激昂的革命宣言，進而稱許“人民雙十節”的降臨。對自由民主的“新雙十”和“人民雙十節”的召喚，是戰時中國文學的雙十節書寫隨著時間推移所顯現出來的重要面影，更是左翼文人面對雙十節記憶資源的一種有意識的爭奪行為。

[關鍵詞] 戰時中國文學 雙十節 民族國家觀念 國族立場 話語交鋒

[中圖分類號] I20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23)03-0172-09

節慶紀念構成了週期性的特定時刻和意義“製造”方式，折射出歷史發展的複雜動向。節慶紀念不光作為歷史活動而存在，也是文學表現的重要對象，還是文藝圈子內部的重要活動，尤其是在1931~1949年的長時段戰時中國語境下，由於對民族國家認同的強烈需求，節慶紀念的意義變得極為重大，節慶紀念與戰時中國文學的關聯性至為緊密。作為民國時期的國慶紀念日，雙十節尤其是戰時中國作家文人重點關注和言說的對象。相應地，雙十節便成為了戰時中國文學內部極富意味的存在，不僅戰時中國文學的雙十節書寫所講述的內容與歷史材料相比更加豐富，而且戰時中國文學言說、表現雙十節的方式更是打上了文學的獨特印記。在此意義上，戰時中國文學的雙十節書寫可以成為我們深入理解文學如何刻錄、反映社會歷史的一個視域，值得仔細研索。

* 本文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半殖民與解殖民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項目號:20BZW138)、西南交通大學科研啟動費專項項目“戰時中國的節慶紀念與文學書寫研究”(項目號:A1420502052201-74)的階段性成果。

一、“創造新雙十節”：以民族革命精神洗掉“國恥”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引起了全國回應，進而一舉推翻了清朝統治，此日與民國的“特殊關係”一方面表現在它所攜帶的民主自由思想，另一方面則在於它開啟了強勢的革命進程。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愈發嚴峻的外敵入侵成為整個中國知識分子和文人群體的關注重心，此後的雙十節文學書寫莫不深深浸染於“國難”、“國恥”的強勁民族主義氛圍之中。與之相應，雙十節所蘊含的反抗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精神的意涵便一再被作家們提取出來、張揚開去，以之為抗戰進程“鼓與呼”。“九一八”事變讓中國深陷民族國家受難的恥辱之中，此時的雙十國慶日在文人眼中失去了本屬於它的歡慶光彩，顯得黯淡無光、令人傷痛：“國慶在眼前，國難在心頭，於是這個大好雙十節，可憐的中華國民，只覺得十分憤慨，十分憂痛，連慶祝的儀式，都停止了，青天白日的國旗，也因此掩蔽了原有的光彩。這是多麼悲觀的世界。”^①有感於此，柯靈更是喊出了“國慶廢”^②的決絕之音。“國慶廢”，即是“國家危”乃至“國家廢”的警戒。

在不少虛構類作品裡，雙十國慶日被設定成了人物遭受欺凌的日子，戲劇《國慶紀念中的國恥》便是這方面的典型例子。雙十節這天古佩文、古秀娟和衛起中三個年輕人在街上被日本兵攔下，受到對方的奚落辱罵。經過一番爭執，日本兵扣下了年輕漂亮的古秀娟。另一邊在五十餘歲老國民黨員白振東的公館裡，一家人正在為亡國而憤慨。妻子提醒大家今天是雙十節，應該想辦法來慶祝慶祝。這時，兒子的朋友古佩文和衛起中來到白公館，報告了古秀娟的不幸遭遇。古佩文又一次提議來紀念國慶日。白振東無奈地回答道：“一面國旗都不准掛，還講什麼慶祝國慶紀念。”衛起中則說：“二十年前的今日，人民還有點自由，現在是中華民國了，我們竟連大門都不敢出。”這時，古秀娟跑了出來，可很快日本兵又追了過來，蠻橫地要帶走古秀娟，並開槍打死了白振東夫妻。白家長子白顯聲用牆角的一面國旗打死了一個日本兵，可轉過頭來，所有中國人都被日本人開槍打死了。事後，一眾日本兵昂首離開，並歡快地表示“今天殺的真痛快”，“咱們回去報告，就說中國人無故打死日本兵士，咱們政府和他們政府嚴厲交涉”。^③自己的國慶日不僅不能正常慶祝，反而在這天喪身殞命。受難和國慶的組合形象地揭露了國族之痛，流溢著一股濃烈的怨恨情緒。當一個國家面對外敵時，怨恨則是凝聚共識、進行國族動員的有效方式，因為這種情緒能夠激起“滿腔的痛苦怨恨和要改變地位的強烈慾望”。^④“改變地位的強烈慾望”落實到戰時文學的雙十節書寫中，便呈現為繁密高亢的解救國難呼聲，作家紛紛號召國人“用武裝抗敵的決心去紀念雙十節！不要使辛亥革命的鮮血憑空讓人的鐵蹄去踐踏！”^⑤

從“九一八”到1937年，作家們的雙十節言說經歷了追憶、悲痛進而大聲疾呼的演變，當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國難的恥辱和悲痛感懷與“用對日全面抗戰來紀念國慶”^⑥的迫切期待又進一步轉化成了對民族革命行為的禮讚、對抗戰前景的樂觀展望。郭沫若曾分析說，抗戰初期的作家們深受戰爭的強烈刺激，在情感態度上“都顯示著異常的激越，而較少平穩的靜觀”，結果初期的抗戰文藝在內容上“大抵是直觀的、抒情的、性急的、鼓動的”。^⑦全面抗戰爆發後的作家雙十節言說便是一種典型的“激越鼓動”筆法。對於當時的中國作家而言，因為國難深重、國恥憂心的感觸太過於傷慘、窒息，所以全民族的共同抗戰才顯得如此振奮人心，誠如靳以所言：“這許多年來我們都是忍辱忍痛過著一天天的日子；我們不是過日子，我們是捱著日子，一直到這一天我們推開了仇敵的手，抹去了身上的血跡，還要一拳打在仇敵的臉上。這個雙十節正是我們完成這個神聖的使命中的一天，它不再那麼空洞，我們應該來慶祝它，在這一天我們用喜悅和了鮮血畫著個雙十字，它將永遠光輝，永遠明亮。”^⑧與抗戰文學中激越情緒的很快回落不同，戰時中國作家的“激越鼓動”式雙十節言

說一直有跡可循,紀念雙十,展望抗戰的光明前景,鼓舞民眾的抗戰信心,類似的文章不勝枚舉。

紀念雙十節被賦予引導民族主義情緒、動員民眾抗戰力量的重要意圖,這在戰場上尤為顯著。胡蘭畦便描繪了一場“火線上的雙十節”景象:當人們正在興致勃勃地準備雙十節慶典舞台時,突然下起了滂沱大雨。民眾並未因為風雨的阻隔退縮,而是如期到達。軍民迎著風雨一起慶祝雙十節的行為,折射出磅礴堅定的民族反抗熱情和戰鬥力量。緊接著是雙十節紀念大會的莊重場景:首先是共唱黨歌的環節,因為在鄉下沒有國旗黨旗,也沒有總理遺像,所以便以唱黨歌來代替。鄉民們雖然沒有唱黨歌的修養,但軍人合唱的聲音“也就很夠雄壯了”,“歌聲很嚴肅地傳播到空中,也很嚴肅地打在每個農民的心上”。然後,由軍部代表講演,雨越下越大,風越吹越凶,幾百人卻站在風雨之中打著傘,戴著斗笠,靜靜地聽著。很快,群眾中爆發出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趕走東洋赤佬!”的嘹亮口號聲。最後,人們又接連合唱起了《打倒東洋》、《軍民聯合歌》、《保衛大上海》等壯烈歌曲。黨歌在此不是停留於黨派的層面,而是上升到了國歌的高度,與之後的一系列抗戰歌曲一道構成了鮮明的政治象徵,成為“國民統合及民眾動員”^⑧的有效方式。整個紀念大會,風雨不休,每個人都濕透了衣衫,然而大眾的熱情卻居高不下,而且越來越多的民眾不斷冒雨加入進來。最後,紀念大會圓滿閉幕,人們在返回的路上沿途唱起了雄壯的歌曲,“歌聲和雨聲,演出另一種的音樂”。^⑨風雨不改踴躍參加紀念大會,在大會中合唱戰鬥歌曲、高呼戰鬥口號,大會結束後保持高亢的戰鬥熱情,這個火線上的雙十節營造出團結一致的光輝場面,形成了“一個全民共生的熱烈核心”,^⑩是民族革命精神能量的集中呈現。

閻重樓曾說:“革命成功,民國肇建,歡聲振耳,國旗飄揚”,是過去的國慶;“三省失陷,淞滬蒙劫,國難方殷,普天同憤”,屬於現在的國慶;“驅退倭寇,還我河山,國基鞏固,華胄復興”,則是未來的國慶。^⑪“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作家們熱衷於回憶著“過去國慶”的光榮、怨怒著“現在國慶”的恥辱;“七七”事變後,鼓舞人們創造“未來國慶”的圖景則大量呈現於筆端。如果說“過去的國慶”是以熱淚來回眸,“現在的國慶”是以呻吟來紀念的話,“未來的國慶”則是以血肉來鋪就。

抗戰強勢激發了中國民眾的民族主義意識,而作為中華民國奠基和象徵的雙十節則是凝聚和張揚這股民族主義意識的絕佳時機。回望過去的雙十節是為了吸取先輩的革命精神,審視現在的雙十節是為了突顯民眾的國族恥辱感受,詢喚未來的雙十節是為了強化國民的反抗力量,在三股合力的作用之下,戰時文學的雙十節書寫有效地將人們的民族主義意識積聚成了民族革命抗爭的洪流,而大力強化、動員民族革命精神的目的,則是為了洗刷國恥、解救國難,完成第一個雙十節所設想卻久久未能實現的目標。正是基於這樣的考量,時人曾以企盼“新雙十節”的語氣來定位戰時中國的雙十節紀念意旨:“所謂‘創造新雙十節’,大意是:雙十節是民族革命初步成功的紀念日,現在,中華民族革命尚未成功,需要來一次比辛亥革命更偉大更熱烈的大革命。辛亥革命僅僅推翻了滿清政府,仍沒有掙脫掉帝國主義的重重束縛;尤其是最近幾年來,國土日蹙,外患日深,民生痛苦不特未曾解除,並且日有增加,目前急切需要實現民族解放大革命,也就是復興中華民族運動的開始,這樣的一天,便是新的國慶紀念,換言之,也可說是‘新雙十節’。”^⑫以民族革命精神洗掉國恥的戰時中國文學雙十節書寫,就這樣被賦予了“創造新雙十節”即“重造民國”的深意。

二、“奴才的雙十節”:製造順民與國族身份守護

國慶是一個國家的重要象徵,“一個國家永遠有國慶紀念日,就是表示這個國家建國精神的永遠不墜,不僅紀念過去的光榮,尤在振奮未來的興盛。有國慶日,就是有國家。紀念國慶,就是不忘國家”。^⑬國慶紀念的有無及冷熱情況,國慶紀念日場景的正面與否與國家觀念、國族身份認同息息相關,因此戰時

中國文學才會呈現出諸多國慶冷落場景和被扭曲的雙十節日形象,以之傳遞出深沉的國族身份感懷。

戰時中國的雙十節本該是統合國民意識、強化民族精神的國家節日,可不少作家卻描繪了民眾借雙十節慶之機大肆享樂的情景。譬如,沈聖時在《雙十節晚上》一文中描寫到,“雙十節,黃昏的街,店舖前掛滿了黨旗國旗、‘雙十節大廉價’的廣告幟,各舖子樓窗上的喇叭大鼓搥得有勁兒地,街,比平日熱鬧多了”,三個青年就在這種氛圍中心安理得地將雙十節當作“尋快樂的日子”。^⑮縱情享樂的雙十節景象在孤島作家筆端尤為常見:“我們緩步在街上,有十月的海風輕飄,此身所沾的垢污,仿佛已淡忘。當年田野戰痕,依稀猶在,幸有大廈處處,散放著霓虹的光,播送著爵士的音響。到今天,再也看不見一些血光,聽不見一些火藥的音響,景況是十分升平,十分酣暢。”^⑯本來提醒人們“造成民國休忘卻”^⑰的雙十節卻成了沉溺享樂的普通節日,身處其中的人們已然遺忘了紀念雙十節所要求的戰鬥精神,這是一種自甘為奴的表現,嚴重之時便會葬送自己的國家。丁聰的一幅畫作形象地描繪了這種“危險的慶祝”,畫中一對時髦的男女正站在“十字架”上縱情歡愉,而他們腳下的“十字架”卻被洪水環繞,即將沉沒。

在雙十節享樂沉迷或者輕易淡忘敵人暴行的人群,進一步便會淪為殖民者的臣民乃至幫兇,這些人的雙十節自然成為了“奴才的雙十節”。在胡之疆看來,淪陷時期的雙十節就是典型的“奴才的雙十節”:當汪精衛還沒有向日本屈膝,即當淪陷區還飄蕩著“五色旗”的時候,“奴才”們紛紛對“雙十節”表示著冷淡,因為他們深知“日本人怕提中國革命,因此盡可能躲避這個節日的風景”。即使提及了雙十節,也阿諛“日本人協力”幫助創建民國的功勞。有的人甚至列名舉姓地說日本人如何在革命初期,幫助孫中山先生,批評中國現在竟和幫忙的人打仗,“是國民黨的忘恩負義”。汪精衛反叛後,便在“五色旗”上端“添上一塊三角型的小黃布”,雙十節也在“小黃旗”底下“被公開了”,可這面“小黃旗”不過是“舞台上的幌子”,滿街飄的“小黃旗”像是“七月半道士在打醮”;汪偽“要人”們更是每逢雙十節便會發表談話,報紙就會把“要人談話”用大標題,加上紀念儀式來應景,談話的內容無非是鼓吹“和平”、“親善”,附帶“說一些感謝日本的話”。結果,大聲小音充斥的“雙十節”處處顯露出滑稽的姿態,無時無刻不在給以中國人的尊嚴“一種嘲弄”。^⑱

事實確乎如此,汪偽政權以辛亥革命和孫中山遺囑的唯一合法繼承者自居,極力利用雙十節紀念來建構自身政權的合法性。具體而言,汪偽政府的雙十節紀念,一再凸顯“中日和平”的合理性,為其“和平運動”服務;反復連接“孫—汪”的“革命”承繼關係,以顯示自身的正統性。^⑲與之相應,汪偽政權御用文人的雙十節紀念文章便濃墨重彩地渲染抗戰帶給國人的深巨創痛,進而導向居心叵測的奴隸式和平主張,這樣的雙十節著實是遺忘民族國家身份的表徵,成為了“向主子歌舞昇平的日子”。^⑳

汪偽文人的雙十節書寫屬於主動為奴的表現,與此同時,殖民者更會想方設法將受殖者製造成服帖的順民,而雙十節則是被用於製造順民的重點時域,老舍的小說《四世同堂》以文學筆法對之進行了精彩刻寫。北平淪陷後,日本政府特意挑選雙十節這天利用全城的中小學生來舉行大遊行,以便“慶祝”佔領保定。汽車上、電車上、人力車上,人家與鋪戶的門前,都張燈結綵,學生們被強制性組織起來,要求手持寫有“大日本萬歲”字樣的小紙旗,從街上走向天安門廣場,去聆聽日偽政府官員的“訓令”,去“向日本旗與日本人鞠躬!”^㉑強迫學生在雙十國慶日這天去遊行和聽講,最終目的是希望以此來讓中國人“去收容歷史上未曾有過的恥辱!”“去在日本人面前承認自己是亡國奴!”^㉒

大衛·科澤在關於政治儀式的研究中借用一個烏克蘭人的話說:“要分裂人民、驅其為奴是不可能的,除非偷走他們的神聖節日,踩毀他們的聖殿。”^㉓日本人在雙十節這天迫使北平民眾遊行“慶祝”佔領保定,無疑便是“偷走神聖節日”來驅使中國人“為奴”的策略。而中國人之中又恰好有部分人不能識別日本人的陰謀,或者即便清楚個中深意也依然甘願“把屈服叫作享受,忍辱苟安叫作明哲保

身”，²¹主動配合殖民者的政治“操演”。祁瑞豐便覺得國家淪喪不是什麼了不得的大事，因而他以湊熱鬧的心態前去參加遊行並甘當領隊。遊行當天，祁瑞豐甚至“極大膽的穿上了一套中山裝！”祁瑞豐深知日本人一定能“看清他之穿中山裝是只為了‘裝’，而絕對與革命無關”。這樣一來，祁瑞豐就既可以獻媚於日本人，又可以大出一番風頭，“又有一片牛好向朋友們吹了”。²²冠曉荷則深信“改朝換代的時候是最容易活動的時候”，²³因為其中有個肯降與不肯降的問題，只要肯投降就能獲取好處，所以他主動去觀看學生們的熱鬧，以便拋頭露面，引起日本要人的注意，進而獲得做官的可能。

祁瑞豐、冠曉荷之類人物，並不將身著中山裝和革命性有無的問題相掛鉤，並不清楚和看重雙十國慶日與國家命運休戚相關的意義，他們“沒有自己的見解，而願意接受命令；只要命令後面還隨著二兩酒或半斤肉”。²⁴故而，此類人物如此心悅誠服地按照侵略者的意圖行事，如此理所當然地捨棄與己相關的雙十慶祝而投靠於侵略者所創設的“反節日”²⁵慶祝活動之中，這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奴才式雙十節”，遺忘、冷落、背叛雙十節的後果是受殖者進入了一個為殖民者精心策劃的“強迫性忘記的時代”，²⁶成為了一個個合乎規格卻完全不自知的“順民”。

主動順從的“奴才式雙十節”顯然是一種丟棄國族身份立場的表現，而《四世同堂》中祁瑞宣的雙十節表現雖然沒有自甘為奴，但卻左右為難，呈現出來的國族身份認同同樣不夠健全。祁瑞宣拒絕參加遊行，“他不能去大睜白眼的看著男女學生在國慶日向日本旗與日本人鞠躬！”²⁷可是，從另一方面想，他也不夠盡責，至少也不夠勇敢。他不願辭職，更不敢帶領學生起而抗爭。祁瑞宣只能在心裡默默期盼著學生們能夠做出一些了不起的舉動，他甚至希望學生能夠與敵人抗爭進而“濺出點血”。然而，祁瑞宣又十分害怕有不幸事件發生，因為中國在軍事政治上的失敗，“其咎不在學生”，學生也“沒有用血替別人洗刷點羞恥的責任”。又其次，祁瑞宣認為只有血氣方剛、富有知識的學生“才是愛國的先鋒隊”，假若這些學生也都像祖父輩那般萎縮，或者像祁瑞宣自己這樣前怕狼後怕虎，就是“表示著民族的血已經涸竭衰老了”。²⁸一方面洞悉敵人的邪惡念頭，對之心生憎惡，另一方面又不敢決絕地與敵人撕破臉皮；一方面憧憬著學生們能夠採取行動與敵人抗爭，另一方面又害怕看見學生們流血受傷。面對侵略者的壓迫，祁瑞宣前後矛盾、猶豫不決的態度折射出了飽受撕扯的國族身份觀念，這也是“奴才式雙十節”的重要面向。

順從的人已經無視雙十節的國族隱喻，彷徨的人在雙十節也不夠果敢，眼看雙十節就要被敵人所完全改塑，民族國家身份將要淪喪殆盡，這時被迫參與遊行的學生們採取了沉默的反抗方式來維護雙十節的尊嚴，進而維護自身的國族身份立場。學生們雖然不能拒絕遊行的命令，但他們卻將敵人期望的熱鬧、歡快、乖巧的大遊行改編成了“嚴肅的、悲哀的、含淚的”“亡國遊行”。學生們“低著頭，含著淚，把小的紙旗倒提著，他們排著隊，象送父母的喪似的，由各處向天安門進行”。²⁹在行進過程中，學生們的口“都被恥辱給封嚴”，沒有喇叭與銅鼓，沒有高呼口號聲，“大家只是那麼默默的，喪膽遊魂的，慢慢的走”。³⁰當學生來到天安門，當敵人開始宣講時，天安門的肅靜和學生的沉默反過來把敵人的一切做派凸顯得越發渺小：敵人、敵旗，在高大城樓的“鎮壓”下“仿佛不過是一些毫無分量的毛羽”，日本人的講話聲也如“一個小兒向大海狂喊一聲”那般無足輕重，收不到任何反響。學生們一聲不出，天安門莊嚴肅靜，敵人不得不承認自己“仿佛受了誰的愚弄”，“好象一個猴向峨嵋山示威”。³¹沉默這時宛若一種不動聲色卻極為有效的武器，至少沉默的中國人沒有讓自己的國慶日完全淪喪變質，沉默的抵抗是對自身國族尊嚴的頑強衛護。

有關“奴隸式雙十節”的書寫多集中於孤島和淪陷區作家筆下，此類景況極具民族恥辱感，讓人悲憤萬端。其中，也有少數人會採取決絕的行為進行抗爭，如丁星在《烽火中的國慶日》一文中便描寫了

一場青年人在孤島所發動的雙十節慶祝遊行：大家手持宣傳品，高唱著《義勇軍進行曲》，結成一種散兵線，分批進入法租界和公共租界進行抗日宣傳。遊行途中，有一批人被巡捕抓走，很快就被釋放。慶祝活動最終顯得比較順利，感染了不少群眾，也讓參加慶祝的人們傾吐了心中的民族“積鬱”。^⑤但是，由於生存環境的拘囿，人們在描畫“奴才的雙十節”時，義無反顧的批判言辭頗為少見，更多是採取《四世同堂》裡學生們那種無言的抗爭。儘管語氣有著軟硬隱顯的區別，但它們都對“奴才的雙十節”發出了警醒，都在敵人的順民製造聲浪中堅定地守護著自身的國族身份立場。

三、走向“人民的雙十節”：從怨言噴湧到內部革命

抗戰時期，民族主義思想處於十分強盛乃至於統領性的地位，受此影響，作為國家象徵之一的雙十節也就被諸多作家構設成強化民族意識、激發抗戰能量的有效手段。不過，隨著時勢的發展變化，尤其是當種種負面現象在現實語境中大量湧現出來後，作家們的雙十節感受和書寫便日漸被不滿、哀怨和失望情緒所籠罩，此類批判性言論在左翼文人那裡更是發展成了進行內部革命的迫切呼喚。如此一來，文學的雙十節影像，就成為政治話語表達與爭執情形的完美表徵。

毫無疑問，對外進行民族抗爭、謀求自由獨立是雙十節的一大要義，同時對內反抗壓迫、追求自由民主也是雙十節的重要意涵。正如胡適所評價的那樣，“種族的革命和政治的革命”是雙十節的兩層意義，所謂“政治的革命”就是指推翻帝制、使中國變成了“一個民主共和國”的進程，這個革命被胡適認為是“五千年中國歷史上的一件最大的改革”。^⑥既然民主自由是雙十節擁護的思想觀念，因此當現實語境之中出現不民主、反自由的現象時，雙十節自然會被人們拿來作為反駁的支撐。魯迅在紀念1933年的雙十節文章中，別出心裁地抄錄了雙十節前後報紙上的新聞目錄，其中既有“蔣主席電國府請大赦政治犯”這樣的官樣報導，又有“冤魂為厲，未婚夫索命”一類的無聊新聞，更有“加派師旅入贛剿匪”類的內爭消息，最後魯迅以一份報紙刊載的“今年之雙十節，可欣可賀，尤甚從前”一語作為結語。光怪陸離、糟亂不已的新聞報導與這句“可欣可賀”的雙十節讚語之間形成了極大反差，更重要的是，這篇輯錄新聞目錄的雙十節紀念文章居然沒能刊出，魯迅慨歎說：“蓋雙十盛典，‘傷今’固難，‘懷古’也不易了。”^⑦田漢則在雙十節紀念文章中明確批評道：“四千餘年專制惡毒並沒有‘一旦掃而空’，掃空了的只有幾條阿Q式的辮子”，雙十節已然“成了不反映絲毫民眾熱情的空虛的慶日”。^⑧

在左翼文人那裡，紀念雙十節籲求民主自由，顯得理由充足且行為正當，更重要的是，雙十節和民主自由呼聲的結合，能夠對國民黨壓制民主自由的行為進行十分強勢的批判，進而使得自身在政治權力話語的交鋒中占得先機。矛盾的大量雙十節紀念文章就提供了這方面的典型案例。在《“雙十”閒話》一文裡，作者開篇即表明自己無話可說，因為說說眼前的“牛鬼蛇神”，“立刻要遭凶”；說說將來的希望罷，只有“老著面皮將糞窖上‘裝金’”這一法，不然也是大逆不道。唯一比較妥當的做法是“說說舊話”：元年，五年，十年，由你喜歡罵就罵上幾聲；如果時間再近一點兒，又是“不行”，“聰明人一定不悅”。同時，追想“先烈”們如何艱難締造的，無疑是“最裸亮的舊話了”，但此類“舊話”在“小心到二十四分的人”的眼裡，又會犯到了反襯出“後烈”不如的嫌疑。總之，“回憶之類是最不好的東西，一回憶就要想，一想就惹上了邪氣”，而“治國平天下的至理應該是不准想”。在此情況下，茅盾表示雙十節紀念只好以打哈哈之類的語詞來應時。並且，他替政府“解圍”說：“在下想來，要是我們這個國當真有‘難’的話，這責任都在那些‘先烈’們身上。誰叫他們幹得那麼不光鮮，留一個大木梢給後頭人扛？再說，誰叫他們革命革命倒革出些官僚和軍閥來，以至貽禍民國，鬧了毛二十年的內亂，並且甚至於到現在還常常聽說還有什麼新官僚，新軍閥？”^⑨這是一篇“諷刺國民黨只准人們談風月”^⑩的雙十節紀念

文章,通篇反語的模式對政府阻礙言論自由、形同軍閥的現象予以痛徹揭露。在另一篇文章中,茅盾進一步以一句前後矛盾的發言來揭示國民黨政府的卑劣行徑:“今天本地平靜,然而緊張”。這句看似不通的話,是官方報導“事件”的一個通行“公式”:第一天報告在某處有某事發生,第二天報告“漸歸平靜”,第三天就報告“和平解決有望”,第四天大概就有“業已和平了結”的新聞。譬如中日雙方的豐台衝突事件就是這“公式”的標本,官方報紙以“互相道歉了事”來記述事件的“和平了結”過程,而西文報紙卻偏偏說是“中國軍隊退出豐台營房了事”。一位朋友看了這把戲,跌足歎道:“照這樣下去,我們哪一天做了亡國奴,自己還沒法知道呢!”⁴¹有鑒於此,茅盾堅信即便民眾要用任何形式來紀念雙十節,官方報紙事後的報導都會以“前日國慶……各地平靜”的話予以紀載。“平靜”的祥和圖景是被加工渲染的,“緊張”的真實面貌則被有意遮蔽,這是一種極具衝擊力的雜文筆法,以這樣的筆法來刻畫、譏刺政府的反民主作風,顯然比簡單直截的政治口號式言說有力形象得多。

國民黨的所作所為在左翼文人看來已經與雙十節彰顯的民主自由精神相悖,除此之外,左翼文人更利用雙十節紀念為契機,訴諸人民的名義向政府索要自由民主:“學生早畢業一天,是老師的本領強。學生遲畢業一天,是老師的本領弱。人民是迫不及待了,國家的現勢是迫不及待了。強盜已經快要打進我們的後堂,我們還要讓全家的人在旁拱手受訓;只聽老師講書,不准學生開口;只看老師執鞭,不准學生動手;那是多麼危險的事呵!‘民主不好拿來囤積’,新故威爾基的這句話好像是在譏諷我們。不管它吧,我們不囤積也算囤積了三十二年。——三十二個雙十,是二十二倍的‘十萬火急’了,在今天‘民主’的銷場最暢的時候,我們何不也來它一個大量傾銷呢!”⁴²基於同樣的考慮,郭沫若在小說《雙簧》裡追記了一段人民力量在雙十節紀念儀式中戰勝反革命對象的往事。那是1926年的雙十節,適逢北伐軍攻破了武昌城,國民黨青年會組織召開了一次雙十節慶祝大會,郭沫若當晚代理鄧演達到晚會上講演。郭沫若未到場之前滿以為青年會“是為革命的勢力所懾”,殊不知一到現場,竟然看到一名司會者在報告中,想方設法闡明“孫中山乃基督教信徒”的觀念。於是,當郭沫若上台發言時,便對司務長的言論大加譴責,批評說:“有人如要剝你的外衣,你索性便奉送你的內衣。有人要打你的右臉,你索性更讓他打你左臉。這些愛的教義,我們中國人一直不假言說地是實行著的。怎見得呢?有人割去了香港,我們索性便讓他租借九龍。有人奪去了越南,我們索性送他一條滇越鐵路。有人佔領了朝鮮,我們索性奉送以滿蒙。我們中國人真真是比任何基督教徒還要基督教徒。”⁴³郭沫若的一番講話,極受聽者歡迎。最後,全場合唱了一次《國民革命歌》,熱狂的群眾如同“潰了堤的海潮一樣向會場外湧去”。這時,“傳教偉人”張惶起來,哀求大家留下來做祈禱,群眾則回之以堅定的答案:“要什麼祈禱!要什麼讚美歌!不唱了!不唱了!”追記此事讓郭沫若更加認識到了人民的力量:“想挽回那既倒的狂瀾,只有人民的力量才能夠”。⁴⁴

郭沫若在抗戰時期回憶的這段雙十節紀念大會,是想展示和強調人民的正義性和強大力量,同時以司會者曲解革命和革命偉人的做法來揭露國民政府對革命和雙十節的玷污,最終小說便傳達了對“人民的雙十節”的禮讚稱許。當抗日戰爭勝利後,知識分子們更是堅信迎來了“人民的世紀”。可是,緊接著大希望而來卻是洶湧的大失望。正當剛從戰爭桎梏中被釋放出來的人們滿懷大希望時,國民黨又挑起了新一輪的戰爭,物價急速攀升,生活愈發艱辛,大希望很快便被洶湧的大失望所擊碎,文人的雙十節書寫又開始大肆噴湧出種種怨言,所謂“年年此日年年慶,節節光明節節空”⁴⁵是也。對雙十節的失望和放棄,便是對整個國家的失望和放棄。這時,沒有黨派色彩的知識分子自然呼籲國共雙方握手言和:“我們深深地希望,國家的局勢,能夠轉好,內戰能以肅清,社會經濟能以有辦法穩定下來,讓全國民眾能以無憂無慮的過幾天太平的苦日子,那末,到那時這雙十節,就有些意思了。”⁴⁶而左

翼作家則抓緊機會揭露國民黨對雙十節和辛亥革命所追求的民主自由理想的違反，將民眾生存苦難的罪魁禍首通通歸之於此一違反行為，然後強調進行內部革命的正義性、迫切性與光明性：“中國人民犧牲了千百萬人的性命掙脫了日本帝國主義所加予我們的鎖枷，而在不知不覺之中另一種更大的帝國主義者又把他們新的鎖加在我們民族的身上了。言政治，‘壞政府’的惡名已經舉世皆知；言經濟，農村凋敝，工商業破產，通貨膨脹到了天文學的數字；言文化，政府坐食自己的一切諾言，不僅偶語棄市，封禁橫行，甚至批評一下政府，呼號一下民主，隨時都就有被暗殺的危險。”面對這種情況，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場用革命的手段徹底推翻違背雙十節真諦的政府：“善意的期待，溫和的‘請願’，委婉的批評，這只招來了專橫者更兇殘的壓迫。奴隸的鎖銬，還是要用自己的力量來打碎。”^④

“對舊政權的行徑作審判是構建新秩序的行動”，^⑤左翼文人的上述雙十節言說就是為了“建構新秩序”而對舊政權施行的“審判”，此類模式在解放戰爭期間隨處可見。如果說在抗日戰爭期間，左翼文人對國民政府有違雙十節精義、壓制民主自由行為的駁斥，還是採取嬉笑怒罵等多樣化的文學手法，那時他們的雙十節書寫與政治發言的語詞還存在著鮮明的差異。那麼，解放戰爭期間，這批文人則無一例外採取了一種斬釘截鐵的強硬語氣，使用著與政治公告毫無違和的語言，手持“人民”的利器對國民黨發出了激昂的革命宣言。因此，茅盾筆下那種形象化的、諷刺意味十足的雙十節筆墨已經被《一年間的認識》這樣的論文式雙十節發言文章取代，郭沫若那種借古諷今、典型刻畫的雙十節筆墨也已變成了類似《雙十節的三大教訓》這樣的政治檄文。隨著人們雙十節書寫的政治批判性的加強，其雙十節書寫的文學面貌也日漸改觀。外部的雙十節紀念經由作家文人的主體感知，文學與政治的分界逐漸被打破，文學自身被重新鍛造，文學已經不再是舊時那個單純的文學。

戰時中國文人的雙十節紀念書寫，屬於一種對過往記憶的回望和言說，不同派別的文人對雙十節的回望和言說必然是各有側重的。1948年第2卷第3期的《新人》雜誌刊發了名為《走過了“雙十”》的漫畫，畫中一名壯碩的青年手擎火把大踏步地向前奔跑，在他身旁的延長線上聳立著印有1948年之前各個年號的十字碑。此畫的表面意思是勇毅的青年告別了無數悲辛的“舊雙十”，正奔向一個光明燦爛的“新雙十”；而“舊雙十”無疑是指國民黨掌控的“雙十節”，“新雙十”則代表著人民享有的自由民主的“雙十節”，因此漫畫的深層寓意便是對“走向人民的雙十節”的禮讚。對自由民主的“新雙十”和“人民雙十節”的籲求，正是戰爭語境下中國文學的雙十節書寫隨著時間推移所顯現出來的重要面影，更是左翼文人面對雙十節這一記憶資源的一種有意識的爭奪行為。

四、結語

國慶是一個國家最為重要的節日，它既是國家精神的結晶，也是聚合國民認同的時域。而當一個國家遭遇外敵入侵時，國慶紀念必定會成為凝聚國民精神、動員抗敵力量的重要慶典，“九一八”事變之後，有關雙十節紀念言說的猛增便與此相關。作為與民國肇建有特殊關係的國慶紀念日，雙十節包含著“民族主義精神”和“民主自由追求”兩個層面的意涵。抗戰時期，由於外敵入侵，人們紛紛通過雙十國慶日紀念來“昭往策來”，進而激發國民“團結向上報國之精神”，這是雙十節“民族主義精神”層面的弘揚。與之相應，戰時中國文學也大量通過雙十節書寫來凝聚民族主義精神、增強民族國家力量，這時的雙十節面影與戰時中國文人的國族身份表達相互勾連。另一方面，戰時中國文學還熱衷於通過雙十節書寫來表露生活艱辛的感慨和精神受限的憤怒，“民主自由追求”的雙十節面影便彰顯開來。解放戰爭期間，以雙十節紀念言說來抒發怨言、籲求民主，進一步成為左翼文人倡揚內部革命的強勢理由。戰時中國文學的雙十節書寫，就此顯現出國族身份表達與政治話語交鋒的面影。

- ①獨鶴：《停止慶祝的國慶日》，上海：《新聞報》，1932年10月10日。
- ②柯靈：《國慶廢》，上海：《社會日報》，1936年10月10日。
- ③周玉崑：《國慶紀念中的國恥》，北平：《郁文週報》，1931年，第19、20期合刊。
- ④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馮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第220頁。
- ⑤鄭伯奇：《怎樣紀念雙十節》，上海：《社會日報》，1936年10月10日。
- ⑥周木齋：《用對日全面抗戰來紀念國慶》，上海：《社會日報》，1937年10月10日。
- ⑦郭沫若：《新文藝的使命——紀念文協五周年》，廣西桂林：《半月文萃》，1943年第1期。
- ⑧靳以：《雙十節》，《我們的血》，上海：烽火社，1938年，第39頁。
- ⑨小野寺史郎：《國旗·國歌·國慶：近代中國的國族主義與國家象徵》，周俊宇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283頁。
- ⑩胡蘭畦編著：《戰地一年》，上海：生活書店，1939年，第55頁。
- ⑪莫娜·奧祖夫：《革命節日》，劉北成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54頁。
- ⑫閻重樓：《國慶的三時期》，上海：《新聞報》，1932年10月10日。
- ⑬豹：《雙十過後話雙十》，上海：《力報》，1938年10月12日。
- ⑭陳彬和：《國慶與國家》，上海：《文友》，1943年第10期。
- ⑮沈聖時：《雙十節晚上》，《落花生船》，北京：海豚出版社，2013年，第97頁。
- ⑯白雲（張天鷲）：《孤島即景》，上海：《社會日報》，1938年10月10日。
- ⑰林孔翼輯錄：《成都竹枝詞》，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5頁。
- ⑱⑲胡之疆：《淪陷的“雙十”》，上海：《中華時報》，1946年10月10日。
- ⑳周遊：《汪偽政權對“雙十節”的紀念與闡釋》，石家莊：《社會科學論壇》，2013年第7期。
-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老舍：《四世同堂》，《老舍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第270頁；第267頁；第260頁；第283頁；第280頁；第270頁；第278~279頁；第259頁；第268頁；第276頁。
- ㉞大衛·科澤：《儀式、政治與權力》，王海洲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11頁。
- ㉟老舍：《四世同堂》，《老舍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第686頁。
- ㊱童敏、李永東：《街道的日常與政治：〈四世同堂〉中的節日與“反節日”書寫》，福州：《福建論壇》，2019年第4期。
- ㊲㊳保羅·康納頓：《社會如何記憶》，納日碧力戈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頁；第3頁。
- ㊴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上海“孤島”文學作品選》（下），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年，第213~216頁。
- ㊵胡適：《雙十節的感想》，北平：《獨立評論》，1934年第122號。
- ㊶魯迅：《准風月談·雙十懷古——民國二十二年看十九年秋》，《魯迅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341頁。
- ㊷田漢：《從第一個雙十節說起——紀念第二十三個雙十節》，《田漢全集》第十五卷，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0年，第249頁。
- ㊸止水（茅盾）：《“雙十”閒話》，上海：《申報·自由談》，1933年10月19日。
- ㊹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591頁。
- ㊺茅盾：《紀念日預感》，上海：《申報每週增刊》，1943年第40期。
- ㊻郭沫若：《寫在雙十節》，《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十九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第497頁。
- ㊼㊽郭沫若：《雙簧》，上海：《東方文藝》，1936年第3期。
- ㊾郭聞聲：《雙十節抒感》，上海：《立報》，1946年10月10日。
- ㊿英氏：《烽煙遍地話雙十》，上海：《時兆》，1947年第10期。
- ①夏衍：《中華民族一定勝利的》，上海：《文萃》，1946年第1期。

作者簡介：高強，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講師，博士。成都 611756

[責任編輯 桑海]